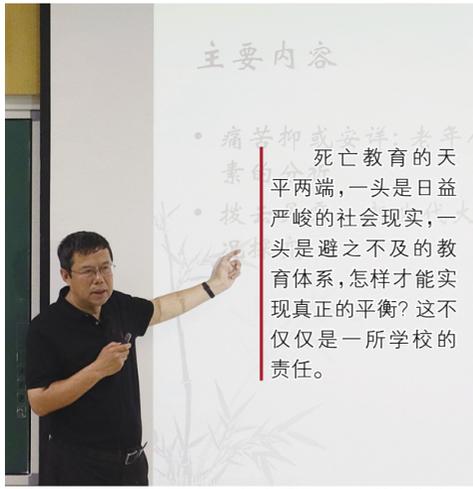


主要内容

死亡教育的天平两端，一头是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一头是避之不及的教育体系，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平衡？这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责任。

得了「空心病」的年轻人 需要补上这堂课

本报记者 赵宇彤



陆杰华在《死亡的社会学思考》课上授课。 陆杰华供图

“你们想过吗？总有一天你们也会死。”“老师，我们每天都想死。”王云岭话音刚落，一个女生立马起身回。看着对方认真的神情，他意识到，这不是玩笑。

“你们都这么想的？”台下齐齐点头，七嘴八舌地附和：“老师，我们太累了，课又多，压力也大。”“每天都在忙，但根本不知道在‘卷’什么。”“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王云岭一时语塞。这位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愈发清晰地感受到，更多年轻人正在被“空心病”吞噬：他们情绪低落，丧失了对生活的兴趣，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这不只是王云岭一个人的发现。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曾调查发现，在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年级新生中，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

“人生有何意义？这正是死亡教育要回答的根本问题。”王云岭告诉《中国科学报》，人总有一死，怎样不虚度这短暂的一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然而，在偏见与质疑声中萌芽的死亡教育，正如“房间里的大象”，正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最欠缺的一堂课

“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或者伤害他人呢？”

时间回到2005年，看着新闻中的大学生自杀事件，时任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师的王云岭，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意识到，大学生需要一堂课来认识、理解、敬畏生命。

几乎是同一时间，400多公里外的北京大学，时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也开始关注死亡议题。

“我长期关注老龄健康研究，1998年开始做‘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总会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到死亡的过程。”现在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陆杰华告诉记者，2005年，他们在调查中增加了关于死亡的内容，将死亡原因、临终状态等议题纳入其中，并率先将“善终”列入老龄健康研究的范畴。

不同的社会现象，指向了同一个被长期回避的话题——死亡。王云岭向学校提议，开设一堂专门讨论死亡的课程。这不是突发奇想，早在2000年，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就开设了《生死学》选修课，成为国内最早的拓路者之一。

而在大洋彼岸，20世纪50年代就已掀起“死亡觉醒运动”。196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罗伯特·富尔顿正式将死亡教育引入高等教育体系，80年代末，相关学术文章又陆续传入我国。

然而，这无法撼动我国“乐生恶死”的文化根基。

“死亡教育？难道教学生怎么自杀吗？”学

校反复考虑后，还是把他的申请搁置一旁。王云岭不愿放弃，“等悲剧真的发生在我身边，再干预就来不及了”。

他回到所在的基础医学院。“医学生们有更现实的需求，比如接触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时，难免会有恐惧心理。”王云岭不厌其烦地解释死亡教育的必要性。

“可以开这门课。”王云岭没来得及高兴，对方又泼了盆冷水：“但死亡教育四个字太直白了，会误导学生，得改。”王云岭再退一步，那就叫“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只要能开课，他不怕折腾。

“我们不敢谈死，却总有一天不得不面对死亡。”王云岭无奈道，死亡教育就像“房间里的大象”，长期被集体回避、忽视，成了当代人最欠缺的一堂课。

王云岭决定作出改变，尽管他也忐忑万分：会有学生选这门课吗？如果人数不够，课程会不会又被取消？

这次，现实给了他惊喜。“秒空！”王云岭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120人的名额瞬间报满。“学生们对死亡也是充满好奇的。”这让他信心倍增。

2006年，《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正式在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拉开序幕，2013年被评为山东省精品课程，2015年起上线多个在线教育平台，至今线上累计学习人数超过30万。

名为谈死，实为论生

“爸爸妈妈，我以前经常惹你们生气，对不起。虽然我已经去世了，但是希望你们不要难过，死亡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这不是真正的遗书，而是王云岭收到的一份课堂作业。

“我们常说‘向死而生’，怎样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不如先行一步，走到人生终点回顾自己的一生。”王云岭发现，大多数人往往只谈论别人的死，却从不考虑自己或亲人的离去。

“人为什么不敢谈论自己的死亡？”他参考了恐惧管理理论：人类依靠世界观、自尊与亲密关系抵御死亡焦虑。其中，自尊的作用尤为关键——通过回顾生命中的“高光时刻”，确认自己没有“白活”。

如何通过一堂课，让学生们敢于直面死亡？王云岭犯了难。再三考虑，他决定从死亡的定义入手。

“什么是死亡？”他抛出第一个问题。台下迅速抢答：心跳、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没有一个不是王云岭想要的答案。



学生们在参与“醒来”体验活动。

王云岭供图

“是你们离死亡更近，还是我离死亡更近？”他更进一步，课堂炸开了锅，夹杂着零星笑声。

“一定是我吗？”王云岭耐心地等着学生思考。“自杀”“猝死”“意外事故”……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蹦了出来，学生们慢慢意识到，这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

讨论声渐渐退潮，看着一张张拧着眉头的脸，王云岭接着问：“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你会怎样写遗书？”

“我和一个很爱的人过了一辈子。”“请不要叫醒我，让我再睡一会儿。”“向天再借五百年”……五花八门的答案背后，暗藏着学生们对生命的思考。

“根本目的是实现‘死亡意识的唤醒’。”王云岭希望学生明白，“死亡”不是冰冷的医学名词，它与衰老、失能、临终关怀紧密相连，是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人生结局。

这远远超出了医学对“死亡”的界定。

“死亡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事件，更是一种社会、身体、心理和精神事件。”陆杰华严肃地说，2017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死亡的社会学思考》，从社会结构、人口变迁、个体化趋势等社会学视角，引导学生思考死亡、临终与丧亲对个体情感的冲击，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

2018年，一位社会学系的学生旁听一学期后，次年又选修了这门课。“我问他原因，原来是儿时父亲去世的经历让他对死亡有了特别的关注。”也有学生告诉陆杰华，“这门课中关于死亡统计测量和人口学的数据分析，直观地颠覆了我对死亡的模糊想象，死亡成了亟待理性思考的社会事实。”

陆杰华希望从探讨死亡、丧亲等话题开始，

让学生们逐步共情他人、思考死亡，未来面对亲人或自己临终时，能够从从容且勇敢地面对。

“我国死亡教育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逐步发展壮大。”陆杰华指出，其最终目的是改变态度和行为，把对死亡的恐惧变成对生活的热爱。

走出校园的“生死课”

“你都没死过，怎么能讲好‘生死课’？”围绕死亡教育，质疑从未停止。

讲课、互动、小组讨论，教室里的“生死课”确实难以呈现出更多形式。怎样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人生与死亡？王云岭陷入沉思。

很快，机会来了。2017年，他收到了一条特殊的信息——济



学生们在参与“醒来”体验活动。

王云岭供图

南市第二殡仪馆的社工苏建在网上看到了“生死课”，主动联络，希望能将课堂搬进殡仪馆。

二人一拍即合。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王云岭精心设计了活动路线：告别大厅、守灵间、骨灰存放处，最后来到遗体化妆间、遗体冷藏间、遗体火化间等重要区域，在讲解员的陪同下，给学生们足够的心理缓冲。

但走马观花的参观仍然难以触及内心，王云岭决定更进一步。

参观结束，回到告别厅，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正在上演：哀乐低回，一位“逝者”被安放在告别厅中央，悼念者依次献上菊花、慰问家属，并在引导员引导下静坐。待音乐结束，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逝者”竟然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

这是苏建和王云岭别出心裁设计的体验活动“醒来”。当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猝然离世，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由学生扮演的“逝者”、亲友、送行者等角色都会想些什么：是壮年离世的惋惜、未竟事业的遗憾、人生虚度的懊恼，还是被抛下的一家老少的哀痛。

“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世界。”活动结束后，不少学生泪流满面，“我们还活着，真好。”

“这样的体验可以让学生们感受到，死亡是真实的，近在眼前的。”为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王云岭特意设计了心理抚慰环节。令他欣慰的是，多年来从未出现学生无法“出戏”的情况。

“如果我比你们先去世，你们会怎么办？”王云岭后来得知，有的学生和父母打了一晚上电话，第一次开诚布公地探讨死亡。“我们还去看了骨灰盒存放处，想到我最爱的人以后也会出现在这里，我才真正感觉到死亡如此残酷。”一位参与“醒来”体验活动的学生说。

除了殡仪馆，还有一个地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命的脆弱——安宁疗护病房。

“原来这里不只老年人，还有不少中青年，甚至儿童。”当陆杰华带领学生走进安宁疗护病房，看着年龄相仿的人躺在病床上，学生们的面色逐渐凝重。“黄泉路上无老少，这类直面现实的体验是‘死亡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

交流环节，陆杰华发现学生对“死亡”的思考维度也在扩展：人工智能复活、数字遗产、宠物殡葬服务、殡葬从业者的“职业污名化”……死亡教育正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我们讲死亡不是为了美化或者隔离它，而是让大家思考怎样让有限的生命更有意义。”陆杰华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死亡”，死亡教育应当走出校园，迈向社会。

赶走“房间里的大象”

“我1964年出生，离死亡应该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听了这门课，我将会更加珍惜生命。”这是一条《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慕课下的评论。

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空心病、倦怠感和意义危机，更多人逐渐意识到死亡教育的紧迫性。然而在校园中，“死亡”依旧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要不要开一门‘死亡课’”“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课程名中能不能出现‘死亡’”……在华东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中，王云岭时常能听到不少高校老师“吐槽”：想开设一门“死亡课”，却屡遭学校拒绝。

“现在开设死亡教育的高校数量大约有四五十所，虽然数量有所增长，但整体占比依旧很低。”王云岭十分无奈。

难道经过20多年探索，学校还不理解死亡教育的价值吗？现实并非如此。

“我在准备山东省的‘开学第一课’时被特意叮嘱，生命安全教育的用语一定要谨慎，可以说‘自伤’，但千万别提‘自杀’。”王云岭叹了口气，时至今日，尽管不少学校纷纷意识到死亡教育的重要性，但在课程开设方面，仍旧持保留态度，或者以“生命教育”替代。

死亡教育的天平两端，一头是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一头是避之不及的教育体系，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平衡？

这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责任。“死亡教育应该从小开始，循序渐进。”陆杰华举例说，比如藏在幼儿绘本中的死亡隐喻：一朵花的枯萎、一片树叶的飘落、心爱宠物的离去……“孩子们能潜移默化地感知，生命都是有始有终的，并接受这一自然规律。”

死亡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贯穿从学前启蒙到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此外，殡仪馆、安宁疗护病房等特殊场所的实践也同样关键。

王云岭以上海为例，作为我国安宁疗护服务最普及的城市之一，尽管已构建起以24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家综合性医院为基础的安宁疗护机构网络，但在2024第六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上，一项研究指出，目前上海市社区护士接受死亡教育专业培训的比例不高，死亡应对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专业人员面对死亡尚且存在恐惧心理，更何况普通人。”王云岭一脸严肃，“整体而言，目前我国死亡教育做得还远远不够。”

而要补上这堂人生必修课，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寻梦环游记》《人怨师》《三悦有了新生活》等影视作品将“死亡”带到公众视野，“死亡咖啡馆”等多样化线下空间也应运而生，为谈论死提供广阔的空间。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攀登，站上巅峰，也意味着临近死亡的悬崖。“死亡教育就像一把‘降落伞’，能缓解我们直面人生终点时的恐惧与无助。”陆杰华说，唯有直面死亡的深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这正是死亡教育的意义。

追忆俞孔坚：天空与大地间的未竟叙事

唐克扬

当地时间9月23日晚，中国建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在巴西潘塔纳尔地区拍摄一部关于“海绵城市”的纪录片期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享年62岁。

俞孔坚如同他创办的机构“土人设计”（Turenscape）之名那样，来自土地，也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963年4月出生于浙江金华东山村，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他大学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并在该校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现更名为哈佛设计学院，简称GSD）深造，获设计学博士学位。

我和俞老师的渊源也在这里开始。我在赴美学习后，第一次听说哈佛大学也有实用的“设计学科”。与他类似，我最终也获得了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在美国从事设计工作。不同的是，我在国内并没有任何相关学习经历，所以对学完之后能干什么懵懂无知。在就读于GSD之前，我是从“土人设计”公司的成果和活动中，逐渐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门名为“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学科，而这正是他在北京大学创办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核心专业。

这一专业工作并非无中生有。中国明末的《园冶》开卷即为“兴造论”与“园说”。据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所述，中国现代建筑学科的奠基人

之一梁思成先生曾经憧憬过一个广义的“营造学科”，涵盖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园林绿化等方面。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专业人才培养长期由林业大学/农业大学等专科培养，仅有少数院校例外，如同济大学。1951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市城市建设局合办“造园组”，从建筑学院独立出去，成为中国第一个风景园林学科。

分久必合。国际建筑师协会1999年于北京举办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所拟《北京宪章》中，我国建筑大师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科学领域要“融合建筑、地景”（作者注：landscape的另一译法）与城市规划”。而实际的人才储备和学科体系建设又与融合的愿景颇有距离：长期以来，“兴造”与“园林”两大体系各自发展，各有偏重，更不用说在中国更具权威性的“城市规划”凌驾于二者之上。各学科根基不同，争论合作。但分久必合的种子早在确定学科名目时就已种下，不是园林，而是“风景园林”，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造园者并不甘心囿于古典园林的一角，他们考虑的是更大的环境营造问题，甚至国土资源的开发与使用。

地位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环境美学家”，在时代机遇中转而成为弄潮儿。除了景观建筑师（landscape architect）的身份，多家外媒报道中也称俞孔坚为“建筑师和城市工作者”（architect and urbanist）。我想这也说明了俞教授的基本立场：他

强调整体环境营造的意义，同时身体力行，让传统风景园林学科的工作更主动地靠近城市建设和国土规划的核心，甚至极大地影响了以上领域的舆论场。

俞老师回国最初是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曾任城市与区域规划方面的教授。不过，比他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更显著的，是在风景园林同行中引起的争议。争议本身也是机遇的一部分，推动了学科发展的大讨论：“园林绿化”焕新为“景观设计”，“风景园林”不再只是关注古典趣味的造型设计，也关系到土壤科学、水利工程、生态学等等。当然这背后更基本的推动力是某种政治经济学。30年以来，恐怕很少有哪个专业像园林——景观这样纠结于新旧之别，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大概是貌似中立的学术，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和相关从业群体。住在某个“……园”冠名的小区，你一定会意识到，在房地产经济中那些配套景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数量惊人的大开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耗费可观资金，并且衔接城市规划，事实上成了城市扩张野心的一部分。如何以特定理论指导新生的实践至关重要。

或是因为和现实紧密相关，园林——景观专业招生规模飙升，一度成为高等院校一级学科，重点大学中大部分都已设立。俞老师在这方面引领风气，不仅招收学生，而且系统推进译介和学

术工作，创办国际获奖期刊《景观设计学》并任主编，多次召开观点鲜明的国际学术会议。他更为显见的业绩来自大量的国内外实践，以及获得的一系列尤其是国际颁发的专业和学术荣誉奖项，比如2012年当选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会员，2016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20年，他获颁世界景观学和风景园林学界的终身成就奖——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表彰其“为改善社会和人居环境，提高人类福祉作出的杰出而意义深远的贡献”。2021年，他获得“柯布共同福祉奖”，这是生态哲学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最高奖项。

我不止一次和俞老师在各种公私场合晤面。事实上，作为他的师弟，我也不知如何对围绕着他本人的极大争议表态。他反对忽视生态功能的都市美化运动，提出让景观回归健康、生命力的“大脚美学”。“大脚”“小脚”的文化比喻，一度把他看重的“野草之美”和传统园林遗产对立起来，引起轩然大波。这符合他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引入的新视角，有时正是以极端冲突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比辞章更重要的是，是如何看待这一学科中的科学和文化之争。他最初提出的“景观生态学安全格局”中已经蕴含这种冲突：在理想愿景和实地践行之间，至少隔着难以言说的“设计”环节，前者可以宏观完美，后者却是具体、纠葛

于人事的——这或许是整个城市工作都面临的矛盾。如此大的空间，是不可能像家具那样一一雕凿的，需要尊重和顺应自然；而环境的系统和社会生活之间，并不天然是顺承的关系，两面作战的“景观设计”不容易既自然，又符合特定的文化。

从1997年开始，俞孔坚及其团队就开始研究城市水系统，提出“海绵城市”概念，以此比喻自然系统的洪涝调节能力，指出“河流两侧的自然湿地如同海绵，调节河水之丰俭，缓解旱涝灾害”。最近10年，我国城市的治水观念事实上也认可了俞孔坚倡导的“海绵城市”概念。不过，在高度人工化的现实中，观念的接纳和实际操作之间尚有很大的空白有待填补。

必须回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自身，去理解这种尚待弥合的缝隙。这所古老的大学重视“设计”尚不足百年，原因在于，包括建筑学在内的古典学科，通常只讨论城市工作的顶层设计，至于贯彻和执行是工程师的使命，两者在校园之外并不总能匹配。“设计”至今依然吸引着人们艳羡的目光，但是它的双脚仍是在土地上的肉身，独自走不了太远。

从这所学院走出的俞孔坚，讲述的景观故事同时有关天空和大地，却不幸戛然而止。

（作者系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建筑学院/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